



羅隱集繫年校箋

上

Emendation and annotation for all works of Luoyin

李定廣 繫年校箋

人民文學出版社



羅隱集繫年校箋

上

Emendation and annotation for all works of Luoyin

李定廣 繫年校箋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羅隱集繫年校箋:全2冊/李定廣繫年校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ISBN 978-7-02-009726-5

I. ①羅… II. ①李… III. ①唐詩—注釋②古典散文—注釋—中國—唐代
IV. ①I214.23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42271 號

責任編輯 葛雲波

責任印製 張文芳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聯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850 千字

開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張 77.25 插頁 4

印 數 1—3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09726-5

定 價 120.00 元(全二冊)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本書爲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成果
上海高校一流學科建設計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成果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出版說明

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潛心治學，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它是經過嚴格評審，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爲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影響，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羅隱文學史地位之重估（代前言）

羅隱，字昭諫^①，自號江東生，杭州（餘杭郡）新城縣（今杭州富陽新登鎮）人，生於唐文宗大和七年（八三三），卒於後梁開平三年（九〇九），享年七十七歲。羅隱出身寒儒家庭，年少苦學，夙慧能文，博物多知，詩文皆俊拔，有浩然之氣。先後爲丞相令狐綯、鄭畋、李蔚所激賞。羅隱秉承儒家思想，有「執大柄以定是非」的遠大志向，科舉生涯長達二十八年，共考了十多次，終未登第，史稱「十上不第」，歷投湖南、淮南、浙西等藩鎮，皆不得意，於僖宗光啟三年（八八七）五十五歲時東歸杭州，受杭州刺史錢鏐器重，屢遷官職，終老故鄉。羅隱一生主要活動在宣宗後期、懿宗、僖宗、昭宗、哀帝五朝，尤以懿宗、僖宗兩朝爲活躍期。一生大體上分爲三個階段：宣宗大中十三年（八五九）二十七歲前，爲讀書、隱居、漫遊時期；二十七歲至五十五歲，爲科舉求仕時期，其間有數年隱居；五十五歲至七十七歲，是爲官時期，後期邊爲官邊修道，類似於白居易的「中隱」。羅隱一生詩文著述有十六種之多，在全唐作家中名列前茅，但散佚嚴重。今存詩集《甲乙集》十二卷五百餘首，小品文集《諷書》五卷共六十篇，駢體哲學著作《兩同書》二卷共十篇，另存駢體《羅隱啓事》一卷十九篇，小說《妖亂志》一卷十五則，《吳越掌記集》一卷十四篇，以及碑、序、論、狀、賦等駢散文章十一篇。其今存詩文總量在晚唐五代作家中僅次於李商隱。

李商隱、杜牧、溫庭筠生活的文、武、宣三朝，唐朝雖然衰落，但仍有相對安定的局面，和圖強振興的希望。羅隱生在李商隱

（二）隱：隱語，用隱晦的謎語向國君提意見；昭諫：用明白的直接語言向國君提意見。名與字，相反相成。羅隱名與字，典出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等人死後的半個世紀中，時代環境已大不相同了。此時的大唐，政治腐敗，科場黑暗，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已處於大廈將傾、瀕於覆滅的前夕。儘管羅隱是一位具有卓越的見識、獨步天下的文才和凜然的氣骨的知識份子，但生不逢時。羅隱的同僚沈崧在《羅給事墓誌》裏就把羅隱生逢唐末，比爲孔子生於周末之令人興歎。在這樣的亂世中，羅隱的作爲，就是用他那如椽之筆，反映喪亂，諷刺醜惡，憂國憂民，很像安史之亂時的杜甫。由於此時的社會，其混亂墮落程度遠甚於安史之亂時期，因此羅隱的憤怒和抗爭也超過杜甫十倍百倍。也正因爲強烈的批判和諷刺，羅隱的科舉求仕之路就更加艱難坎坷了。譬如咸通八年（八六七）正月羅隱自編的小品文集《諷書》（內亦含詩賦等其它文體）直接目的是用於科舉行卷和納省卷，但因爲批判和諷刺過於強烈，反而連累了自己的科舉之路，正如羅袞《贈羅隱》所言「諷書雖盛一名休」，「一名」唐人指進士及第，意思是正因爲《諷書》，使得羅隱不能及第。羅隱明知《諷書》對自己的科舉及第之路帶來負面作用，仍然不斷用之行卷。原來更重要的目的是借行卷宣傳自己的思想觀點，所謂「警當世而戒將來」（《諷書重序》）。

羅隱在後世百姓心目中最典型的印象是敢於諷刺權貴、絕不向權貴低頭的「錚錚鐵骨」，其實羅隱人格更有價值的部分尚不在此。

宋初著名作家王禹偁《題錢塘縣羅江東手植海棠》評價羅隱人格云：「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以後世人民敬仰的召公比之。羅隱一生信奉儒家思想，晚年出入佛道間，甚至成爲道教大師閭丘方遠的弟子，但從未放棄儒家「忠義」信條，憂國憂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極其堅定。他鄙視藩鎮割據，鄙視朱溫篡唐，忠於大唐王朝的立場從未動搖，這一點與唐末韋莊、杜荀鶴、李山甫等文人形成鮮明對照。唐哀帝天祐四年（九〇七），朱溫篡唐建立後梁，詔書至杭州，羅隱痛哭勸錢鏐舉義討賊，匡復大唐社稷，錢鏐不從，反奉朱梁之正朔。朱溫封錢鏐爲尚父、吳越王，羅隱在《錢尚父生日》詩中仍期望錢鏐「興唐宗社作諸侯」。朱溫授羅隱諫議大夫之官，羅隱不就，作《小松》詩明志，詩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羅隱的「高節」就是忠義人格。《資治通鑑·開平元年》載：「四月，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興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

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曰：「（羅隱）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後來朱溫又屢次封羅隱給事中之官，羅隱堅決不從，大義侃侃。而羅隱親友往往未解其「高節」，以爲「給事中」高官既是本人榮耀，又可光宗耀祖，真是害煞羅隱啊。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對羅隱人格有深刻認識：「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鏐以可歆，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偉哉！其言乎！正名溫之爲『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談諧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爲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讀通鑒論》卷二十八）

自宋代直至民國的近千年裏，羅隱故事在民間百姓中流傳不衰，而且愈演愈烈，羅隱遂逐漸被神化。由於羅隱精通哲學和道家術數之學，對於世事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和預見性，史載羅隱曾向錢鏐預言，說其部下徐綰、許再思二人會帶頭叛亂，可惜錢鏐未聽，後來果然應驗，錢鏐險些喪命（《資治通鑒·天復二年》）。故而民間傳說羅隱是「皇帝嘴，乞丐身」，有「出語成讖」的本領，凡羅隱有預言者，人稱「羅隱題破」。羅隱故事流傳之多之廣，恐非唐代任何其他文人所能及，甚或有「隱重而唐輕」①之論，我國南方十多個省都有大量「羅隱秀才」（有的訛作「羅衣秀才」或「羅游秀才」）的民間傳說。羅隱甚至成爲廣東客家地區民間崇信的神祇，那裏有許多關於羅隱的傳說和歌謠。傳說廣東、江西等地著名的「客家山歌」就是創自羅隱。這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個奇特現象。

（二）明姚士麟《羅昭諫江東集敘》慨歎：「使千百載後，田農閭閻不稱他進士，特重之曰『羅隱秀才』，是隱重而唐輕，進士輕而秀才重也。悲夫！」明閔元衡編《羅江東外紀》，收有大量民間傳說故事。清林用霖編有《羅江東外紀拾殘》。明清浙江、安徽、江西、江蘇、湖北、湖南、四川、廣東、福建等省的方志、野史、小說多載羅隱故事。今人劉金編《羅隱的故事種種》，見《民間文藝集刊（四）》，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羅隱死後葬在故鄉杭州定山鄉，但全國各地的老百姓非常懷念他，給他建造了很多墳墓和祠廟。江西樂安縣、都昌縣，安徽涇縣、南陵縣，浙江蕭山等地皆有羅隱墓。清朝王乃斌《羅昭諫墓》詩曰：「遺稿千秋在，疑阡異地同。」浙江杭州的昌化、新登、溫州瑞安縣，四川羅江縣，安徽南陵縣等地均有羅隱祠廟。這在唐代文人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從大陸當今的各種思想史著作來看，羅隱沒有被提及，而臺灣的各種思想史著作均給羅隱很高的地位，甚至與玄奘、慧能、韓愈並列為唐代最重要的五位思想家之一^{〔二〕}，這一巨大反差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並將會促使我們深入探討羅隱思想，重新審視思想史建構^{〔三〕}。

荷蘭漢學家讓·梅耶爾在《借古諷今：羅隱及其〈讒書〉》中對羅隱思想感到驚詫：「在唐代，很少有作家能夠像羅隱這樣認識到這個帝國衰落的根源，也很少有作家能夠像羅隱這樣將自己的憤慨與失落用文學的形式準確地表達出來（《無能子》例外）。在羅隱《讒書》中衆多價值豐富的材料面前，唐代政治思想史、古文運動及儒道關係的研究者或許都會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四〕}讓·梅耶爾在《羅隱政治思想中的儒家與道家》中感慨道：「雖然羅隱曾經活躍於他那個時代，只是那個時代不幸地為後代所忽視了，因此似乎對中國思想的發展並無任何貢獻，但是，羅隱的著作對研究儒道兩家關係的學者並未失去其價值。如果要徹底地瞭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演變軌跡，那麼，就必須深入地研究羅隱的思想。」^{〔四〕}

〔一〕 如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隋唐五代卷）》，王雲五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蕭公權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薩孟武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張金鑒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等。

〔二〕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七月最新出版的王永平著《中國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之第五章《哲學光華》用一節的篇幅介紹並高度評價羅隱的思想，可能受到臺灣學者影響。

〔三〕 De Meyer Jan A. M.: "Using the Past to Disparage the Present: Luo Yin and His Slandorous Writings."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 Vol. 37, No. 1 (1996. 3): P69—86.

〔四〕 De Meyer Jan A. M.: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Luo Yin." *Tang Studies* (《唐學報》) Vol. 12 (1994): P67—80.

筆者認為，羅隱最重要、最閃光的思想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時運思想。最爲人們熟知的就是他的名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此二句可謂毛澤東一生最愛的兩句唐詩。再如《讒書·道不在人》從宏觀哲學的高度闡述道、時、人三者的關係，闡明了「道不在人」的客觀規律論。認為道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但「道」的實現與推行還得依賴於「時」的「與不與」，如果得「時」，人就能實現「道」之「天功」，反之，如果失「時」，則「道爲人困」。又如《西施》詩云：「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以哲學家的高度深刻地指出家國興亡自有其客觀歷史時運，皇帝的昏庸只是直接導火線而已。這一超越時空的深刻見解，爲毛澤東所激賞，他在此詩標題前畫了兩個大圈，對全詩每字都加了密圈。羅隱時運思想的實質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第二是唯物辯證思想。其《兩同書》十篇處處閃耀著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光輝。如《真僞》篇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僞的唯一標準的思想。再如《王濬墓》詩：「男兒未必盡英雄，但到時來命即通。若使吳都由王氣，將軍何處立殊功？」深刻地說明了「時勢造英雄」的真理，否定了唯心主義的「王氣」說，毛澤東對此深有共鳴，他在此詩標題前畫了兩個大圈，又對「男兒未必盡英雄，但到時來命即通」兩句，每字都畫了密圈。又如《讒書·解武丁夢》對武丁夢得傳說而使國大治這一歷史事件進行別解，實際上是睿智深刻的解釋，作者認為，所謂「武丁夢」不過是武丁的謀略，「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神靈是不存在的，「唯聖能神」，具有治才的聖人能利用民衆敬畏天神的心理來運作政治謀略，挽救時運。

第三是非君思想，第四是明君思想。其非君思想與明君思想看似矛盾，實則又有內在的統一性，值得深入探討。如《讒書·英雄之言》抓住劉邦項羽的兩句所謂「英雄之言」，揭露了以救民塗炭爲旗號的「英雄」們「視家國而取」的行爲，與「視玉帛而取」的盜賊沒什麼兩樣。文章以冷靜犀利的剖析，揭示自古以來皇帝無不是竊國大盜！這一大膽的思想無疑閃爍着深刻的真理光芒。這一思想明顯受到《莊子·胠篋》篇的啟發，但莊子批的只不過是諸侯，而羅隱則直指天子，從而啟發了

清初的黃宗羲。《讒書·子高之讓》寫子高斥禹思想狹隘，以天下爲私有，否定了家天下思想。《讒書·丹商非不肖》不只立論新穎，更可貴的是體現了驚人的膽識，挑戰封建帝位世襲制和家天下，宣揚天下爲公思想。但羅隱在很多地方又極力論證君主的合法性。如《兩同書·貴賤》：「貴賤之分，出於自然，」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兩同書·強弱》：「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

總之，羅隱思想的深刻性和複雜性亟待深入研究。

從大陸當今的各種文學史著作來看，羅隱雖被提及，但聲名不顯、地位不高，並沒有引起文學史家的重視。事實上，羅隱是唐末最重要的作家，是唐代文學史中最後一位巨人，也是文學史上極富個性的作家，其地位的大起大落是歷史的誤會，對羅隱現象的研究，將會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思考文學史。這裡側重從文學角度重新審視文學史中的羅隱。

一 「負宇內之雄名」——「溫李」之後執文壇牛耳

雄霸晚唐詩壇的兩大詩人「溫李」相繼去世後，唐王朝又苟延殘喘了近半個世紀，這幾十年作家作品的數量空前增多，文壇不僅沒有沉寂，其熱鬧紛雜甚至超過「溫李」時代，文學史上稱爲「唐末文學」。唐末詩人中較有影響，詩史留名的不在少數，像皮日休、陸龜蒙、羅隱、韋莊、韓偓、鄭谷、司空圖、杜荀鶴、方干、吳融、崔塗、貫休、薛能、黃滔、唐彥謙、秦韜玉、聶夷中等等，皆無愧於名家稱號。尤其是羅隱，可謂繼「溫李」之後獨步唐末詩壇半個世紀，這一事實並未被今人注意和揭示。

首先，皇帝、宰相、大臣、強藩眼中的羅隱：「名震天下」。

羅隱在咸通、乾符中與宗人羅鄴、羅虬並稱「三羅」^(二)，又與同鄉詩人章碣齊名^(三)。當時有人將羅隱與前輩詩人溫庭筠、李商隱合稱「三才子」，說他們三人先後受知於宰相令狐綯^(四)，這是相當崇高的評價。不錯，作為詩人的令狐綯，于同輩中最看重溫李詩，于後輩中最欣賞羅隱詩，他對羅隱詩的癡迷更甚于溫李，他的兒子令狐綯躋躋舉場十多年方登進士第，羅隱以詩賀之，令狐綯對兒子說：「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唐詩紀事》卷六十九）可見其對羅隱詩的崇拜。據《舊五代史》本傳載：「羅隱，餘杭人。有詩名于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大為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可見羅隱詩傳之相府，誦之閨閣。鄭畋、李蔚在令狐綯之後相繼為相，鄭畋更是唐末最為著名的賢相兼詩人，其《馬嵬坡》絕句還入選家喻戶曉的《唐詩三百首》，他能如此欣賞一個白衣秀才，可見得羅隱詩名在當時的影響。宰相李蔚在當時最欣賞羅隱和陸龜蒙詩，他咸通十四年鎮淮南時將羅隱攬在身邊，請羅隱為自己的詩集指點，還在生日宴上請羅隱賦詩。^(五)權傾一方的魏博節度使羅威（即羅紹威）酷嗜羅隱詩，將自己的詩集取名為《偷江東集》（羅隱詩集原名《江東集》），自認羅隱為叔父。羅隱亦傲視之，羅威幕僚皆罵羅隱「介布衣竟狂傲如此，羅威說：「羅隱名震天下，王公大夫，多為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侄行，為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六)僖宗朝平定黃巢亂後，欲召羅隱為朝官，結果被忌憚羅隱的大臣阻撓（《北夢瑣言》卷六）。唐昭宗久聞羅隱詩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譏，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鑠？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

(二)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羅虬辭藻富瞻，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

(三)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五：「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

(四) 《北夢瑣言》卷二《宰相怙權》。

(五) 參羅隱《廣陵李僕射借示近詩因投獻》、《荀令生日》詩。

(六) 事見《舊唐書》卷一八一《羅威傳》、《五代史補》卷一。

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唐詩紀事》卷六十九）吳越王錢鏐辟羅隱簡書比羅隱爲王粲、孔子，又《題贈羅隱》評羅隱曰：「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吳越備史·羅隱傳》）可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人以爲此評有誇張吹捧之嫌，但作爲主子，無須對部下阿諛奉承，若有過譽，亦當發自真誠。

其次，當時文人眼中的羅隱：「負宇內之雄名」。

韋莊、吳融在光化年間先後兩次上疏昭宗皇帝^{〔二〕}，要求追賜李賀等「麗句清詞，遍在詞人之口」的才子孤魂及第，「見存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在與他倆同輩的衆多未及第詩人中，只提羅隱一人。羅隱的僚友沈崧在《羅給事墓誌》裏評羅隱曰：「名宣寓縣，譽播蠻夷」，「摘藻千篇，諷誦在時人之口」，並將羅隱生值唐衰，比爲孔子生於周季之令人興歎。唐末著名詩人黃滔、杜荀鶴、吳仁璧、徐夤、貫休、齊己、歸仁、羅袞、劉贊等，都有贈詩或悼詩評價羅隱的詩文和人格。徐夤《寄兩浙羅書記》詩曰：「憐君道在名長在，不到慈恩最上層。」羅袞《贈羅隱》評羅隱「寰區歎屈瞻天問，夷陌聞詩過海求」。黃滔在《潁川陳先生集序》裏說，爲使陳先生（散文家陳黯）「釋泉台之永恨」，遂力請「負宇內之雄名」的羅隱爲陳集作序。黃滔《與羅隱郎中書》又評羅隱的文章爲「麟經下筆」（即孔子作《春秋經》），「馬史抽毫」（即司馬遷作《史記》），說自己在羅隱文章前不敢措辭了。詩人吳仁璧《還羅隱書記詩集》將羅隱比作李白杜甫：「自有聲詩符至道，何須名姓在殊科。耒陽城畔青山下，蘭麝於今滿逝波。」韓國文學之父崔致遠年少來中國學詩，第一個拜訪學習的中國詩人就是江東羅隱，而羅隱亦關懷這一異國後輩，將自己的五卷歌詩贈示崔致遠。^{〔三〕}

再次，民間老百姓眼中的羅隱：「天下皆知羅隱」。

〔二〕 見韋莊《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吳融《代王大夫請追賜方干等及第疏》。

〔三〕 金富軾《三國史記》卷四六《崔致遠傳》：「（致遠）始西游時，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隱負才自高，不輕許可人，示致遠所製歌詩五軸。」

史載羅隱久困名場，十分沮喪，有賣飯嫗勸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五代史補》卷一）黃巢亂後流落民間的樂工李長史，在金陵得羅隱兩首贈詩，引以爲豪，多年成誦在口，還出示于詩人吳融（吳融《贈李長史歌序》）。唐末五代民間還流行所謂的「羅隱帽」〔二〕。

最後，羅隱詩在唐末五代最流行。

五代陶穀《清異錄》卷三載：「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剗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所謂「剗刺」，就是抄寫名紙（名帖），也就是用白居易、羅隱二人詩百首來裝飾名帖，反映了白、羅二人詩在唐末五代最爲盛行。五代後周詩人張翼嘗投詩兩軸于宰相王溥，王溥誇讚道：「格調宛同羅給事，功夫深似賈司倉。」〔三〕從這些記載中都可以看出羅隱詩在五代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二 「世人稱之者少，何也？」——冤沉千載及其原因

自宋代直至民國的近千年裏，羅隱的詩文和事蹟仍在下層文人和民間百姓中流傳不衰，甚至被神化，但在上層文壇、正統文化和文學中，其名聲和地位急遽下滑，時或遭受歷代批評家的譏評乃至詆毀，遂逐漸湮沒成爲唐末五代「平庸」詩人之一。

宋初詩人王禹偁、范仲淹還極其仰慕羅隱〔四〕，姚鉉《唐文粹》選羅隱文十四篇，與李商隱數量相同，宋初有詩僧詠羅隱題詩

〔二〕 陶穀《清異錄》卷三。

〔三〕 張齊賢《洛陽繹紳舊聞記·第一》。

〔四〕 見王禹偁《題羅隱手植海棠詩》、范仲淹《唐異詩序》。

石曰：「一時章句令人憶，萬古聲名與日齊。」（盧建其《寧德縣誌（上）》）但自歐陽修之後，羅隱的頭上失去了光環。宋祁、歐陽修撰《新唐書》不為羅隱立傳，歐陽修《新五代史》只提及羅隱名字，卻無半句記述或評語。宋人洪邁云：「詩盛于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為鄭谷，為羅隱，為杜荀鶴。」（《黃御史集原序》）明人楊慎甚至認為羅隱不及其同宗羅鄴，《升菴詩話》卷三十五「三羅詩」條曰：「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鄴、羅虬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為首。」

當然，也有別具慧眼的評論家為羅隱辯護的。清薛雪《一瓢詩話》針對楊慎對羅隱的譏評指出：「『三羅』其名，隱為最，虬次之，鄴斯下矣。」陸次雲《五代詩善鳴集》亦云：「雖曰鄴、隱齊名，畢竟隱雄於鄴。」明末胡震亨認為：「韋莊乏閱深，杜荀鶴多俚淺，黃滔力孱弱，皆不及羅隱，酣情飽墨，『未少佳篇』（《唐音癸籤》卷八）。胡以梅對羅隱詩極其欣賞，其編於康熙年間的《唐詩貫珠》共收唐詩二千四百首，並強調其選詩標準為「是編初盛中晚四唐悉采，止論工拙以定取捨」，收羅隱詩一百三十餘首，在全唐詩人中僅次於杜甫、白居易，位列全唐前三甲。紀昀等四庫館臣也對唐末詩人的優劣有所評判，《四庫全書總目·唐英歌詩提要》認為吳融詩歌以「工拙」（藝術）論，高於韓偓，但不及羅隱；《黃御史集提要》又認為黃滔詩有「貞元長慶之遺風」，雖非徐寅諸人所能及，但不如羅隱詩。一般認為，《四庫全書總目》通常是在通讀博覽和精研考辨的基礎上作出判斷，有別於許多明人不讀晚唐五代詩而妄下論斷。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間專研唐末五代詩的名家李調元對羅隱相當看好。李氏積三年心血編就了近百卷本的鉅著《全五代詩》（含唐末詩），又在其《雨村詩話》卷下裏綜論唐末五代詩道：「五代自以韓偓、韋莊二家為昇堂入室，然執牛耳者，必推羅江東。其詩堅渾雄博，亦自老杜得來，而絕不似宋江西派之貌襲。世人稱之者少，何也？皮、陸輩雕文刻鏤，近乎土木偶人，少生趣矣。」李氏認為羅隱詩水準高於韓偓、韋莊、皮日休、陸龜蒙，在唐末五代自是執牛耳者，為什麼卻受到世人的冷落呢？李氏的不解之問，正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是羅隱詩歌的諷刺、淺俗兩大特色嚴重違背儒家溫柔敦厚詩教和雅正觀。羅隱詩文最突出的特色是諷刺，羅隱式的諷刺與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溫庭筠、李商隱等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諷刺的程度極其尖銳、辛辣，所謂鋒芒

銳利，刺入骨髓；諷刺的範圍上至皇帝、宰相、藩鎮，下到貪官污吏、惡劣文人，社會陋習，「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唐才子傳·羅隱》）；諷刺藝術上的最大特色是寓莊於諧，常常使人忍俊不禁。可以說，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以辛辣諷刺為主要特色的詩文作家，首推羅隱。儒家並不反對諷刺，但必須要做到「溫柔敦厚」「主文而譎諫」，否則無法接受的。羅隱式諷刺顯然嚴重違背儒家詩教，故而為封建統治者以及正統的封建文人所不容。羅隱詩歌另一個較為突出的特色通常以為是淺俗，其實，準確地說應是條暢。羅隱的多數絕句少用或不用典故，力求語言通俗條暢，當然也有少數詩過於淺俗，成為某些人攻擊的把柄。事實上，通俗條暢是整個唐末五代詩歌的總趨勢、大氣候，非獨羅隱一人，羅隱詩論高雅不及司空圖，論粗俗不如杜荀鶴、貫休，恰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而崇雅黜俗是儒家一向秉承的文化藝術傳統，尤其到了宋代以後，雅俗尖銳對立，士大夫文人崇尚人格上的儒雅，詩文上的雅正，貶抑狂狷之士、淺俗之詩，更鄙棄粗俗、淫俗詩詞。羅隱受到冷落自不難理解。

其次，從盛、中、晚唐的盛衰正變觀念出發，長期貶抑晚唐，鄙棄唐末。宋以後人論唐詩，喜歡與社會政治的盛衰相聯繫，逐漸形成盛、中、晚唐的盛衰正變觀念。「四唐」不只是時段或風格的區分，更是價值的判斷。如果說某詩人是「晚唐」或「晚唐體」，就是貶低。這實際上是以「盛唐」為既定法則來攻「晚唐」，晚唐詩有任何新變都是違背法則。至於咸通（八六〇）以下的唐末詩壇，更是自鄙而不齒了。如計有功曰：「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繁而調急。」（《唐詩紀事》卷六十六）明人論唐詩，在宋人基礎上進一步走向極端，對於已被宋人貶為「自鄙」的唐末詩歌，在不讀不研究的情況下，肆意攻擊，幾近惡毒。從宋人的三唐盛衰論，到明人的四唐正變論，唐末代表詩人羅隱都難逃作為批判的鵠的。清代某些有識之士如錢謙益、葉燮等高度肯定唐末詩成就，正如胡以梅《唐詩貫珠序》所云：「四唐之詩，初以高宏，盛以雄豪沉著，中則悠揚秀麗，晚則刻畫深入。唐末才人位雖不達，憔悴浪跡，而佳製猶多。」但這些意見未能根本扭轉長期以來的偏見。

再次，《唐才子傳》、《唐詩品彙》和《唐詩三百首》三書給羅隱的負面影響。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明清以來影響甚巨。辛

氏時或在某個詩人傳記後附一段自己的評論，他在卷九《羅隱傳》之後有一段尖酸刻薄的評語，極貶羅隱的人格，雖也承認羅隱的「學術」不朽同乎經史，「事業」有五鼎之重，但總體上對羅隱是否定的，有痛恨羅隱自毀長城之意，反映了辛氏本人對羅隱式譏刺的難以接受。明人選唐詩皆崇盛唐而貶晚唐，《唐詩品彙》自不例外，但問題是該書對羅隱的定位極低，屬於唐末之下者。該書總共選六百二十位詩人計五千七百六十九首詩，規模特大，但羅隱只掛靠在「餘響」中入選六首，羅隱特擅長且流傳頗廣的七絕，一首未選。即使在「餘響」的隊伍裏，羅隱也遠不及同時代的李頻、劉滄、韋莊、陸龜蒙、曹唐、鄭谷、張喬、于濆、劉駕等人（皆入選十首以上）入選之多。至於清代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可以說是所有唐詩選本中名氣最大的一種。該書對於羅隱詩如同對待李賀一樣，一首不選，而寧願選唐末陳陶、馬戴、鄭畋、李頻、張喬、秦韜玉、韋莊、韓偓、杜荀鶴、崔塗、張泌的詩。

最後，是對於羅隱學識、才力、風格的誤解。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唐末詩人的學識、才力不足，故而不能寫出大氣磅礴的詩篇，只能經營風格淺俗、纖細的短篇律絕。此論看似頗有道理，其實是片面之論。唐末亂世中確有一些較平庸的詩人，學識、才力不高，但像羅隱、陸龜蒙這些優秀詩人並非如此。羅隱既是詩人，又是學者，其著述多達十六種，在全唐詩人中亦為罕見。雖散佚嚴重，所幸今存詩文的總量和種類，在整個晚唐五代重要作家中，僅次於李商隱，與陸龜蒙相當，超過杜牧、溫庭筠、韋莊、韓偓、皮日休、杜荀鶴、司空圖等人。羅隱的多數絕句不喜用典，但七律特擅用典，尤其是讀駢體《羅隱啟事》，發現用典如獺祭，不僅用得密，而且用得妙，可見其學識當不在樊南之下^{〔二〕}；至於《諷書》的政治思想，《兩同書》的哲學思想，其深刻性和震撼力足可媲美昌黎、夢得。諸史籍也稱其博物多知。^{〔三〕}原來，追求語言流暢、提倡近體詩，是唐末那個時代總體文化趨向，

〔二〕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溫、李俱善作駢語，故詩亦綺麗。（羅）隱之表啟不減兩生。」

〔三〕 《西湖遊覽志餘》卷十二稱其「博物能詩」，沈崧《羅給事墓志》：「國僑博物，舌幹多知。」